



二十世纪全纪录

1925

周丽琼 主编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1925 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记事	1
1925 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召开	15
1925 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16
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21
孙中山先生热心教育	33
杨文永 1925 年诞辰	37
省港大罢工爆发	44
廖仲恺遇刺	95
江鱼诞辰	97
小资料	98
世界部分	106
世纪回眸	106
美国三州的龙卷风杀伤力强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06
萧伯纳 1925 年诺贝尔文学奖	113
希特勒重新组织纳粹党	114
德国物理学专家 G. 赫兹和弗兰克	122
小资料	126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1925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记事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为了总结统一战线建立一年来的经验,迎接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朱锦堂、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杨殷、何今亮(汪寿华)、向警予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代表14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其中40%是工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中央工作报告,完全同意中央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失误,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

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了一份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

出席 1924 年六七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

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等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会议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共 11 个议决案。

大会分析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形势，总结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批评了党内统一战线工作中“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指出右倾错误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强调指出，大会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目的和地位。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问题，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问题。《议决案》指出：“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这个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议决案》提醒全党要时刻警惕右倾危险。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及现在的趋势，指明今后职工运动的方向。《议决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为此，决不忘记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使工人阶级有强固之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证。

《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指出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议决案》指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前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

必须尽可能地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并且指出：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要使农民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民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总结了几年来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宣传工作重新整顿。《议决案》指出：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竟因三大关于国民运动议决案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的幼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逐渐发生了右的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议决案》还认为，党的宣传工作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新审定，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地，使党员行动方有新准绳。同时，还决定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刊物）的工作，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还提出设立党校、工人补习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以便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为了扩大宣

传范围，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立编译委员会。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派驻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

瞿秋白在评价四大意义时指出：“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断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新高潮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表明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很大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大会对于怎样取得领导权、怎样实现工农联盟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性。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20 人，代表党员 994 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 5 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四大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

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 年 1 月 26 日至 30 日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代表 18 人，代表全国 2400 多名团员。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青年运动决议案的精神，通过了大会宣言和《经济斗争决议案》、《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宣传及煽动决议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战争决议案》、《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反对基督教运动决议案》等 11 个决议案。大会强调青年群众要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在《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 C·Y 的工作，并不仅限于领导产业青年工人的经济奋斗，及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应在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中，有宣传和组织的活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决定，就是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青年团的无产阶级化、群众化、青年化的问题。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把入团的最高年龄从 28 岁降到 25 岁，规定 14 岁以上 25 岁以下的青年才能入团。大会选举了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刘尔崧、张秋人等 9 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张伯简等 5 人为候补中委。在团三届一中全会上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

任宣传部主任，贺昌任工农部主任。这次大会为动员广大团员积极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 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告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及各被压迫民族青年书
- 3、关于 C. P 第四次大会代表报告决议案
- 4、关于托洛茨基主张决议案
- 5、关于少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报告的决议案
- 6、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决议案
- 7、经济斗争决议案
- 8、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
- 9、宣传及煽动决议案
- 10、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战争决议案
- 11、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
- 12、组织问题决议案
- 13、本国教育及训练决议案
- 1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
- 15、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共青团三届一次扩大会议 1925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和少共国际代表外，还有来自北京、湖南、山东、上海、湖北、河南、广东、唐山、天津、青岛、保定等地的 20 名代表。会议总结了团三大后八个月的工作，指出在这个期间，存在忽视利用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以巩固和发展团组织的倾向，认为当时团的根本任务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实际斗争中，深入青年群众，扩大和巩固团的组织。会议讨论通过如

下决议案：1. 对于出席少共国际扩大会议代表报告决议案；2. 关于 C. P. 扩大会议代表报告决议案；3. 对于中央报告决议案；4. 关于本团目前任务决议案；5. 组织问题决议案；6. 政治宣传工作决议案；7. 经济斗争决议案；8. 学生运动决议案；9. 农村青年工作大纲；10. 儿童运动决议案。这次会议对于动员全团“深入群众”起了促进作用。会后团中央的组织机构做了改组，任弼时任总书记。

共青团三届二次扩大会议 1926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委员、北方区、豫陕区、江浙区、湖南区、广东区及武汉、山东等地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如下决议案：1. 对党第二次扩大会议代表报告决议案；2. 对于出席少共国际扩大会议代表报告决议案；3. 中央报告决议案；4. 目前任务决议案；5. 组织问题决议案；6. 宣传问题决议案；7. 经济斗争及工会工作决议案；8. 学生运动决议案；9. 农村青年工作大纲；10. 儿童运动决议案。会议认为“C. Y. 是 C. P. 在青年群众中一只手”。团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获得青年工农、学生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去领导他们从自己的利益斗争去参加党所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改正以前偏重一般政治运动的弊病”，使组织群众化，工作青年化。同时应注意联合战线的运用，避免过“左”的倾向，引导青年群众做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实际斗争。会议强调宣传工作必须注意“反映一般青年生活及思想并给以正确的指导”，集中力量攻击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基督教及宗法社会思想的反动性，影响和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

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

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展开

（一）关于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中共积极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建设。首先，中共协助国民党组成上海、汉口、北京三个市的国民党的执行部，然后，又相继建立了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级党组织。截至1926年1月，全国已有11个省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有8个省正在筹建国民党省级组织；全国已有国民党员14万人。共产党员在这些地方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对加强两党的合作做出了贡献。6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并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文件针对当时我们党内只注意国民党的工作而忽视自己工作的倾向，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抓紧对党员和工人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全党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

（二）关于在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经过“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革命武装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中共积极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校学习。在军校急需干部的情况下，中共陆续选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人到军校任职任教。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革了军校旧的政治机构，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

密切合作，制定了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以达到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一定政治觉悟、能立志救国救民的革命军人的培养目标。周恩来还亲自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所设的26门课程，大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讲授。这些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个核心内容，培养学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来进行。这就从教育内容上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军校的统一战线性质。

为了保证黄埔军校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加强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还在校内建立了特别支部，在进步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并帮助校内的国民党组织开展工作。1925年1月，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团结全体革命军人的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下，成为中共团结革命军人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工作。1925年1月，创立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借鉴苏联军队的经验，结合一军的实际，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了该军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这年的11月，还创立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

黄埔军校的创立，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后来扫除旧式军阀、取得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培养了干部，准备了人才；一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国共斗争中，对共产党给予了同情和支持，甚至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三) 广东境内叛乱的平息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和广东工农群众运动的日益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恐慌。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以买办陈廉伯和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的广州商团，于1924年10月10日在广州发动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为骨干组成的革命军事力量，很快平定了叛乱。

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看病之机，在英国帝国主义和段琪瑞的支持下，策划从潮汕一带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革命政府于2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在蒋介石、周恩来的率领下，经过黄埔军校学生军的英勇奋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军队的3万多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组建新军队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第一次东征战斗正酣的时候，表面上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暗中同英国帝国主义勾结，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坚决主张迅速平定叛乱，东征军回师广州，叛乱得以平定，使广东政府转危为安。

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陈炯明又重新占领东江，并与另一军阀邓本殷同谋，纠集各路反革命势力，企图进犯广州。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到1926年2月，不仅陈、邓的反动军队主力被歼灭，连海南岛也被国民革命军占领。至此，广东全境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管辖之下。这不仅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也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四) 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战工作

当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向工人开枪,打伤10余人,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打死。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而日本资本家面对愤怒的群众,不但不思悔改,反而采取高压政策,完全关闭罢工的纱厂,妄图以此胁迫工人停止罢工。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2千多学生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随后又举行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当游行群众到达南京路租界巡捕房门前时,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有13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对帝国主义的愤恨。6月1日,在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市、总罢工、总罢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成立上海市总工会,以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6月4日,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由于帝国主义对上海总商会的拉拢、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大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使这一场反帝统一战线遭到了破坏,斗争只取得了部分的成果。

上海的“三罢”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帝革命风暴。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广东的省港大罢工,即广州、香港工人的联合大罢工。1925年6月23日,广州各界爱国群众,10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英国帝国主义开枪打死50多人,打伤100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香港罢工工人由19

日的10万人激增至25万多人,其中有13万人返回广州。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苏兆征被推选为委员长,邓中夏、陈延年等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在领导省港大罢工当中,中共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一,加强广州工人和香港工人内部的大联合、大协作。其二,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支持。聘请廖仲恺为罢工委员会顾问,罢工工人支持国民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活动经费方面和居住条件方面的支持。其三,派人下乡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助工人封锁海岸,查禁日货等,以加强工农的联合。其四,在政治上团结广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保护其利益,争取他们同情工人的斗争。其五,对华侨的商务活动,给予方便,争取华侨支援工人的斗争。中共运用上述统战策略,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使罢工斗争持续16个月之久,在我国工运史上是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不仅使香港一度财政收入锐减,公共事业瘫痪,变成了“死港”、“臭港”,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且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少数民族中,在倡导召开国民会议、抵制段琪瑞策划善后会议等斗争中,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召开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等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出席1924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回顾了三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情况，肯定了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